

# 走出汉学

——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

四川大学 [儒藏] 学术丛书

杨世文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杨世文 著

# 走出汉学

——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王会豪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 / 杨世文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6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614 - 4068 - 1  
I. 走… II. 杨… III. 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宋代  
IV. 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6988 号

**书名 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

---

著 者 杨世文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4 - 4068 - 1/B·185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21.625  
字 数 53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http://www.scupress.com.cn)

# 目 录

绪 言 ..... ( 1 )

## 上 篇 历史选择与经学变古

第一章 历史选择：时代课题与经学变古 ..... ( 25 )

    第一节 时代课题与文化忧患 ..... ( 26 )

    第二节 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 ..... ( 41 )

    第三节 经学变古的基本内容 ..... ( 52 )

    第四节 经学变古与辨疑思潮 ..... ( 60 )

第二章 超越汉唐：旧经学之批判与反思 ..... ( 68 )

    第一节 尊儒卫道意识的强化 ..... ( 68 )

    第二节 儒家经典的重新审视 ..... ( 77 )

    第三节 汉唐经学的批评反思 ..... ( 94 )

    第四节 对待经典与传注的一般态度 ..... ( 109 )

第三章 范式转移：新经学形态之确立 ..... ( 115 )

    第一节 从“本文”到“本义” ..... ( 118 )

    第二节 求“圣人之心” ..... ( 124 )

    第三节 由“四书”通“五经” ..... ( 134 )

## 中篇 经典辨疑思潮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 汉唐经学余波与辨疑学风的滥觞	(151)
第一节 汉唐经学的余波	(152)
第二节 辨疑学风的滥觞	(156)
第五章 “学统四起”与经典辨疑思潮的勃兴	(161)
第一节 学风转变与“学统四起”	(162)
第二节 经典辨疑思潮的全面展开	(171)
第六章 宋学的演变与经典辨疑思潮的发展	(203)
第一节 道学浮沉与宋学的继续发展	(204)
第二节 经典辨疑思潮的深化	(212)
第七章 晚宋学风与经典辨疑思潮的分化	(234)
第一节 晚宋的士风与学风	(235)
第二节 经典辨疑思潮的分化	(242)

## 下篇 宋儒对经典的辨疑

第八章 《周易》经传的辨疑	(269)
第一节 《易经》作者与时代	(271)
第二节 《易传》作者与时代	(282)
第三节 《周易》古本的复原	(303)
第九章 《尚书》的辨疑	(321)
第一节 孔序与孔传	(323)
第二节 《书小序》辨疑	(328)
第三节 《古文尚书》辨疑	(340)
第四节 王柏《书疑》	(349)
第十章 《诗经》的辨疑	(368)
第一节 “孔子删诗”说考辨	(370)
第二节 《毛诗序》辨疑	(384)

---

第三节 废《序》说《诗》 .....	(400)
第四节 “古《诗经》”的复原 .....	(418)
<b>第十一章 《周礼》的辨疑 .....</b>	<b>(433)</b>
第一节 两种《周礼》观 .....	(434)
第二节 《周礼》制度辨疑 .....	(445)
第三节 《周礼》时代考辨 .....	(456)
第四节 “《冬官》不亡”说 .....	(471)
<b>第十二章 《仪礼》的辨疑 .....</b>	<b>(483)</b>
第一节 宋代的《仪礼》学 .....	(484)
第二节 对《仪礼》的辨疑 .....	(491)
<b>第十三章 《礼记》的辨疑 .....</b>	<b>(501)</b>
第一节 《礼记》诸篇考辨 .....	(502)
第二节 考辨《中庸》 .....	(523)
第三节 考辨《大学》 .....	(532)
<b>第十四章 《春秋》经传的辨疑 .....</b>	<b>(541)</b>
第一节 “三传”作者时代辨疑 .....	(543)
第二节 “三传”解经辨疑 .....	(564)
第三节 舍传求经与会通三传 .....	(602)
<b>第十五章 《孝经》的辨疑 .....</b>	<b>(627)</b>
第一节 《孝经》来历的考辨 .....	(627)
第二节 义理取向的《孝经》解释学 .....	(638)
<b>结 论 .....</b>	<b>(644)</b>
<b>参 考 文 献 .....</b>	<b>(667)</b>
<b>后 记 .....</b>	<b>(686)</b>
<b>又 记 .....</b>	<b>(688)</b>

# 绪 言

## 一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唐代中期，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说：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sup>①</sup>

蒙文通先生也提出以唐代为中心，将中国史分为两大阶段（唐前、唐后）、五个时期（以晚周、建安正始、天宝大历、正德嘉靖为转折点）。他认为唐前、唐后中国历史变化最大、最剧，因此中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型时期。虽然此前、

---

<sup>①</sup>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2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此后中国历史也发生过多次重要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局部的。而唐宋之际的变化则是广泛的、深刻的、全面的，影响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是深远的。<sup>①</sup> 唐长孺先生也从社会经济的变化、门阀的衰弱和科举制的兴起、军事制度的变化、学术思想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sup>②</sup>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也把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的分水岭。<sup>③</sup> 美国汉学家包弼德（Peter K. Bol）立足于对古代知识精英“士人”身份地位转变的考察，认为唐宋之际“士人”从门阀士族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转变，论证了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sup>④</sup> 这一类的论著还相当多，兹不一一罗举。

唐宋之际的变革在儒学经学研究上有充分的反映。汉代经学号称“极盛”，但是，也存在着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支离繁琐，二是缺乏义理深度。汉代经生对经典的阐释，往往侧重于对章句训诂的考辨，纠缠于名物制度等细枝末节，而对儒学思想的阐发相对薄弱。因此，经学实际上等同于文字训诂学、文献学。魏晋以后，佛教、道教经过长期的改造、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统的心性理论，大有与儒学争夺思想阵地的架势。中国古代知识精英最害怕的就是“以夷变夏”，害怕儒学失去正统思想的地位。所以中唐以来，出现了一次儒学革新运动。这个运动既是儒学对外来挑战的回应，也是儒学自身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中唐

①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后收入《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253～380页，巴蜀书社，1999。

② 唐长孺：《魏晋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③ 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译本收入《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中国历史论著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④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儒学革新运动反映在经学领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刘知几为代表，对一些儒家经传提出疑问；二是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三是以韩愈、李翱为代表，试图建立儒家的道统论与心性之学。这三个方面也是中唐以来经学变古的主要内容。

唐代中期的文化变动和由此带来的儒家经学研究上的巨大变化，对宋代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儒学革新运动其实是中唐以来学术思想的继续发展与深化。宋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讨论的主题，如建立新的儒学心性论，以抗衡佛、道二教的挑战；经学方面，舍弃繁琐的章句注疏，直接探求经典的本义，重视对儒学义理的阐发，并对儒家经典进行辨疑，清除其中的“伪经”、“伪说”……所有这些方面，都已经由中唐儒者发其端。宋儒继续中唐学者开创的事业，并发扬光大，终于建立了一种区别于汉学的新的学术范式——后世称之为宋学。因此，研究宋代学术，必须溯源于中唐，才能看出学术思想发展的延续性。

## 二

勃兴于北宋中期的经典辨疑思潮，是经学变古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儒家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产物。

儒学创立于孔子，后世崇奉的儒学经典也与孔子关系密切。《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记载，孔子对“六经”进行过整理，有述有作。“六经”经过孔子有意识的整理和伦理化的阐释，才最

后成为儒家学派的典籍，才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中《乐》无书），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应以“六经”并称为标志，“六经”并称起源于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sup>①</sup>。当然，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是相对而言的。孔子以后，儒学不断地发展，其经典体系也在进一步扩大。由“六经”扩展为“九经”，再到“十二经”，最后定型于“十三经”，其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

战国、秦汉之际是儒学发展史的一大转折，也是儒家文献流传史的一个参考坐标。后世对于先秦原典的诸种质疑，多因秦汉之际传授源流不明而起。

儒家经典形成以后，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曲折，包括焚毁、篡乱、附益以及讹误、阙文、散佚等等情况。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秦始皇焚书事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秦汉以后有关伪史、伪说、伪书之讨论，多由此而起。焚书事件对传统学术发展影响极大：首先，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争鸣局面，伴随政治统一的是学术统一；其次，该事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利用政治权力干预学术文化的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再次，也为后来儒学内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虽然有焚书厉禁，但是，秦朝的儒学并未绝迹。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秦代的儒学有着官学和私学的分别，前者以博士儒生为其代表，后者则是在民间传授《易》、《诗》、《书》、《礼》的职业儒者。作为官学代表的博士儒生掌管官方所藏《诗》、《书》典籍以及诸子百家学说的研习、整理和教授工作。另外还有不少活动于民间、以讲说授徒为业的儒家私学人物，如浮丘伯、申公、高

<sup>①</sup> 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载《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董生、孔鲋等。在严厉的禁令下，虽然他们的学术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并未完全停止。这些人对于儒学在秦汉之际的传授、流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也并未完全绝迹。所以，到西汉初年，随着禁令的松弛和最后废除，山岩屋壁之藏又纷纷重见天日，许多儒家经典又被发现。过去任职于秦朝的博士和民间儒生又纷纷开门授徒，传授经典。从战国到秦汉，儒学典籍的传授，其前后传承关系大体上是连贯而清楚的。<sup>①</sup>

除儒家经典师弟相传外，许多先秦典籍在汉代也纷纷被发现。这些文献都是用先秦古文写成的，所以称为古文经。秦火之后比较重要的发现有：一是河间献王得民间所藏古文经，包括《周官》、《礼》、《礼记》、《尚书》等<sup>②</sup>；二是鲁共王刘余“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sup>③</sup>；三是河内女子发老屋得《易》、《礼》、《尚书》等文献<sup>④</sup>。

司马迁之后，还有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是汉成帝时张霸献“百两篇”《尚书》；二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引发的古文经问题。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与中国传统学术史关系甚大，除了通过校书实践，创立了中国古典校讎学的方法与范式外，另外一个最重大的影响就是揭开了经学今古文之争的序幕。刘歆校书，发掘出两部重要的古文经典《左传》与《周官》，从此引发了长期的争论。

① 王启发：《秦代的儒生与儒学》，见《中国哲学》第18辑，岳麓书社，1998。

② 《汉书·景十三王传》、《汉书·艺文志》。

③ 《汉书·艺文志》。

④ 《论衡·正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几桩与经学史关系甚大的公案。一是王肃与《圣证论》及《孔子家语》的问题；二是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的问题；三是晋武帝太康年间发现“汲冢竹书”的问题。宋元以来考辨《古文尚书》之伪，不少学者都怀疑王肃为造伪者。

刘炫是周隋之际北方大儒。他与刘焯并称“二刘”，经学会通南北，对唐代《五经正义》影响甚大。对于刘炫经学，学者有褒有贬。刘炫对经学文献的影响，除将姚方兴本古文《舜典》及注编入今本《古文尚书》外，还有他与《古文孝经》的关系问题。

当然，经学史上的学术公案远不止这些，如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今文尚书》的篇数问题，《易传》的时代问题，《仪礼》的传授问题，《礼记》的年代、作者与篇数问题，《春秋》的义例问题，《左传》的年代与性质问题，《孝经》今古文之争，都是讨论的重要课题。从儒家经典的发展演变史看，有一个不断发现、增加、附益的过程，这就需要加以甄别、辨析。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的兴起，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流传演变史上的一个必然环节。

### 三

北宋中叶欧阳修等人倡导的以卫道为目的对儒家经典与传注的廓清运动，形成一股对经典的辨疑思潮。对此，北宋的司马

光、南宋的陆游以及其他不少学者都曾论及<sup>①</sup>。欧阳修等人给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对“新进后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些“新进后生”并不明白他们的深意所在，只知疑古而不知“明道”。所以司马光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上《论风俗札子》，对当时科场之弊提出批评。其实司马光并不否认对儒家经典以及汉唐注疏有进行重新审视的必要，他反对的是对圣人之经并不了解，对前人之说并不知晓，就人云亦云，妄下结论。

清代考据学家标榜汉学，与宋学划清界限，故对于宋代学术，多加贬抑。尤其对于宋人学风深致不满。四库馆臣说：

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渐矣！<sup>②</sup>

疑经、改经在宋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司马光，在其《古文孝经指解》中就曾改经。对此，清儒毛奇龄批评这是“启后人改经之渐，总是宋人习气，无足道者”<sup>③</sup>。事实上，清学与宋学有非常深的渊源关系，张舜徽先生就曾指出：

乾嘉考证之学，都由宋代学者开辟途径、启示方法、为之先导的。宋代学术范围本广，何可用“空疏”

<sup>①</sup> 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论风俗札子》，《四部丛刊》本；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陆游说，商务印书馆，1959。

<sup>②</sup>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孝经问》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

<sup>③</sup> 《孝经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字抹杀一切。<sup>①</sup>

可以说，清学虽然打的是“汉学”旗帜，但也深受宋学的沾溉，与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sup>②</sup>。

近人对宋学的研究，多侧重于理学，而对经学关注不多。经学研究中，又往往对经典辨疑思潮重视不够。其实，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研究宋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内容，对于研究明清乃至现、当代学术思想史，也有重要的意义。近人的研究虽乏专书，但一般经学史、学术史、文化史著作中对这一问题也多少有所涉及，而对于宋代辨疑诸家之个案研究，则有一定数量之著作与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约略分为三类：一为通论性研究，二为个案性研究，三为资料之辑录。

### 1. 通论性研究

清末以来，对于宋代经典辨疑思潮专门性的研究著作仅有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0）一种，另有几篇通论性的论文，如屈万里《宋人疑经的风气》（《大陆杂志》29卷3期）、王世舜《论宋儒的疑古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祝瑞开主编：《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等等。另外，一些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史（尤其是经学史）

---

<sup>①</sup> 张舜徽：《清代学术的流派和趋向》，见《初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

<sup>②</sup> 关于清学与宋学的关系，历来主要有两派观点：梁启超、胡适等人强调清学对宋学（明学）的反动，而冯友兰、钱穆、余英时等人虽然不否认清学有其创新的一面，但更注意其对宋学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宋明的博雅考证之学对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这两派观点其实都有道理，只不过都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方面有所忽视。清学对宋明之学既有反动，也有继承，不能仅仅看到一面，而不论另一面。

的论著对此也偶有涉及。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又增订本1996），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饮冰室合集》），顾颉刚、王煦华《中国辨伪学史略》（《崔东壁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姚瀛艇等《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杨渭生等《两宋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章权才《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汪惠敏《宋代经学之研究》（台北编译馆，1989）等。此外，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胡昭曦《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刘复生《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等著作中也对宋学、宋代经学或疑古有所涉及。

《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是清末著名经学家皮锡瑞的代表性著作。皮氏虽为今文经学家，但他能够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上，对经学历史予以客观评述。他对经学史的分期，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他的一些见解，也为治经学史者所重视。对于宋代经学，皮氏做过重要论述。在《经学历史》中，他将宋代称为“经学变古时代”，认为“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他还对宋代的“五经”、“四书”之学进行了综述，对宋人疑经、改经风气作了批评，认为“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

训也”。“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经学通论》专论五经，很多条目都涉及汉学、宋学的问题。如关于《周易》，与宋学相关者有“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等篇；关于《尚书》，有“论宋人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论王柏《书疑》疑古文有见解特不应并疑今文”等篇；关于《诗经》，有“论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论马端临驳朱申毛可与朱说参看且能发明风人之旨”等篇；关于《三礼》，有“论言理不如言礼之可据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之说亦由推致而得”、“论郑樵辨《仪礼》皆误毛奇龄驳郑樵而攻《仪礼》之说多本郑樵”、“论熊朋来于《三礼》独重《仪礼》其说甚通”、“论宋儒掊击郑学实本王肃而袭为己说以别异于注疏”、“论郑樵解释《周礼》疑义未可信为确据”、“论宋明人疑经之失明人又甚于宋人”等篇；关于《春秋》，有“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并疑《公》《谷》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论吕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见疑古义宋儒说经多有此失”等篇。皮氏的论述，对于研究宋代经学以及疑经思潮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崇尚汉学的今文经济学家，因此，他的观点往往显示出尊经崇圣、尊今抑古、尊汉贬宋的立场。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成书于 20 世纪 30 年代，非常简略。其第十章“宋之经学”以区区万余字对宋代经学作了提要钩玄，认为“宋初经学，犹是唐学，不得谓之宋学，迄乎庆历之间，诸儒渐思立异”，“宋人经学，其有不守陈义，自辟新术，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或折衷古训，或独抒别裁，或以议论相高，或以综比矜富，或陈往以讽今，明体而达用，既异汉唐之诂训，复

殊道学之义理”，“宋之经学，固极驳杂之观，亦尽品汇之盛”，“宋儒治经，不惟喜新好奇为异于前也，尚有二事颇足以启后人之议，其一曰疑经，其一曰改经”。他对宋人疑经改经的风气总体上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夫自秦火而后，经有残脱，本是事实，史汉所言，昭昭可考。故刘歆、荀悦，皆有不全之叹；必谓经无可疑，未免失之过拘。惟当疑而不改，付诸盖阙，或如汉儒作注，遇有可疑者，但存其说于注下，而不更易正文，以俟学者之心通其意，则自无诬古之嫌。宋儒不此之效，往往喜奋私意，矜为创获，轻肆翦伐，尽变面目，至王鲁斋辈而已极。纵极补缀之工，其能免割裂之诮乎？”总的来说，马氏对宋代经学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观点比较平实。

蒙文通先生的相关论述也涉及宋代经学问题。他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深刻论述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内在关系，宏观论述与微观考证相结合，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他认为，自天宝、大历而后，在学术思想上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次学术思想的变化，发生在文学、经学等各个领域。唐代中叶开始的这种反对旧传统的的新学术，“为宋代一切学术的先河”。但“这一新学术，终唐以至五代，都还没有能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还不能取旧传统的地位而代之，旧学还为当时的王朝政府所倚重，新学仍只能处于在野的地位，而致两者并行于世。及至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但是，新学的幼苗，却是发芽和生长在中唐时期”<sup>①</sup>。蒙先生的这一论断，给我们考察宋代学术文化的源流提

<sup>①</sup>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